

刘锡诚 著

在文坛边缘上

(增订本)

下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在文坛边缘上

(增订本)

刘锡诚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郑州 ·

第五章

在风雨中跋涉

(1981)

《文艺报》改版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文艺报》从1981年第1期起改为半月刊。之所以要改版,主要是因为形势所迫。由于文艺界两种思想的对立和交锋,突发事件频繁出现,别的文艺刊物可以不予表态,而作为文联委托作协主办的综合性评论刊物,《文艺报》就逃不过去,或赞成或反对,一定要有自己的态度,否则,就会被人指责为旗帜不鲜明,“左”啦或右啦。从组织上讲,中宣部和作协党组也需要我们这个窗口来表明对一些现象和问题的态度。过去几年来,我们在一些事情上装聋作哑,能不表态就不表态,着力于推进文学艺术创作的发展,因而受到的责难太多了。从期刊本身来说,一个一月出版一期的月刊,如若把约稿、发稿、排版、校对这些必要的程序加起来,一篇稿件从三审到与读者见面,至少要有两个月的周期,很难对文艺界发生的大事都能照顾到,更难组织或撰写出追踪式的文章。另一方面,我们的头脑也有点儿发热,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的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过,新作家和新作品频出,批评要跟上创作的发展,要促进创作的提高和繁荣,月刊的节奏太慢了。在这一点上,主持作协工作的张光年,也可能跟我们有某种共同想法,他心里大概也有一种1957年《文艺报》周报时代的成就感和恋旧情结。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到了1980年

底,文艺界乃至整个思想战线的形势已经变得异常紧张了。

改版的第1期,没有太多的张扬,只是在《编后》里强调:“使它真正成为旗帜鲜明、丰富多彩的百家争鸣的园地”,“更加鲜明有力地反映时代精神,进一步提高文艺创作的质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是当前文艺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这几句话留下了当年文艺形势的一些痕迹。这些话的背景是:一是突出要“百家争鸣”和“旗帜鲜明”。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有些人指责《文艺报》成了同人刊物,不开展百家争鸣,不发表不同意见的稿件,对倾向不好的作品和文章批评不力,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旗帜不鲜明。二是刊物要“鲜明有力地反映时代精神”,这是中央领导向我们提出来的一个要求,也是针对1980年的文学创作向文艺界提出来的一个导向性的口号。现在以编辑部的名义把它写到了改版号的《编后》里去,作为半月刊的宣言。

胡耀邦于1980年2月12日、13日所作的《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过去了整整一年之后,被指定在《文艺报》1981年第1期上发表,让中央领导思想和苦衷直接与文艺界的广大读者见面。我们并接到指示,陆续组织文章结合文坛实际谈感想。在文前加的“编者按”说:

讲话就当前文艺工作、文艺创作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我们相信,一切关心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的人们,都会从这个讲话里得到启发。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真研读这个讲话。

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战线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和我们所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相比,我们的工作还远远不能满足时代和人民的要求。文艺工作者有必要更深刻地认识新时代,反映新时代;有必要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和创作实际,深入思考,努力探求,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为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艺创作质量,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地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好地

满足人民大众精神文化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做出新的贡献。

按语看似官话,实则语意深长,也许只有我们这些行内的人才能体味。事实上,文艺界是以非常复杂的心情对待胡耀邦的报告的。

鼓浪屿会议

期刊在文学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优秀作品,往往是被期刊编者首先发现的;许多青年作家,也往往是被期刊编者先发现并培养起来的。不管有些作家怎样回避谈论这个话题,几十年来的文坛现实却证明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加重了期刊编辑部的责任。在新时期之初的那几年,文学期刊编辑部之间的交往非常活跃。26家大型文学期刊刚刚于1980年11月下旬在江苏省镇江市举行过一次座谈会,并成立了“中国大型文学期刊编辑协会”,接着,17家省级文学期刊(大多是月刊)又聚会厦门鼓浪屿,商讨这些刊物共同关心的问题。两个会议的议题是不同的。

鼓浪屿会议的起因是什么呢?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80年初创刊了一本以选登其他刊物发表的优秀小说为宗旨的刊物,名为《小说月报》^①,选登全国各地文学期刊发表的优秀小说,读者只要手持一刊,便可尽得全国小说精妙之作,不仅受到读者欢迎,在市场上也十分畅销,发行达200万份。编辑选刊此举,一方面名扬四海,名声渐高;一方面有利可图,挣了不少钱。但许多期刊编辑部的朋友私下里对《小说月报》颇有微词,各地议论纷纷,特别是这样的权威刊物却由一家地方出版社,而非中国作家协会这样的权威机构来主办,不免对其权威性产生疑虑。那时版权法还没有出台,但各地刊物已朦胧中产生了保护版权的意识,于是,17家期刊决定开一次会议来商讨采取什么对策。

^① 《小说月报》1980年1月在天津创刊,林呐、谢国祥、邓元惠任主编,是我国新时期文坛最早的一家小说选刊。

我们刊物没有参加这次会议。《鸭绿江》杂志的副主编、老散文家单复,在与我在昆明一起参加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之后,又到鼓浪屿去参加了期刊编辑部座谈会,并给我寄来一封信,向我通报了会议的结果。

锡诚同志:你好!

在昆明分住两地,未能好好聊聊,实在遗憾。

我由西双版纳回昆明后,接到编辑部电报,要我直接由昆明去厦门参加17家文艺刊物编辑部会议。我又匆匆赶赴厦门。路经上海时,去看了巴金和朗西等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同人。老巴很高兴,临别时送我《家》、《春》、《秋》、《寒夜》、《巴金近作选》、《嚼火集》六本新版书。

厦门会议有两个成果:一、成立21家文学刊物编辑协会;二、由协会出一月刊:《小说》。从1981年起,21家刊物的作品,不准转载。由会刊《小说》自己选载,4月创刊。先印50万册。每月估计每个编辑可得500元红利。

协会推选顾尔鐸为会长,会址设在南京,刊物也在南京出版。

这次我外出50天,前天才回来。回来后,书信积压不少,得处理几天。加以编辑部要开几天会,研究今年刊物如何编好。宣传部还要我们把两年来的刊物检查一下,总结总结。

风闻京中文艺、报刊界又有些紧张,几个著名报纸受了批评。不知真实情况如何?

刘宾雁的《从〈人妖之间〉引起的》一文,香港的《动向》已转载。该刊也转载了《啊,父老兄弟》^①。港刊是很敏感的。

贵刊改版后,一定会有新的面貌,急待先睹为快。

你一定也很忙吧,不多打扰你了,对我们的刊物,多支持多帮助并盼赐大作。

① 祖慰:《啊,父老兄弟》,原载《人民日报》1980年11月8日。

匆此,祝

编安

单 复

(1981年1月)6日

厦门会议,商议出了一个大家同意的主意,即大家合办一家小说文萃性的刊物,名曰《小说》,与《小说月报》平分小说创作的天下,由江苏作协《雨花》的负责人顾尔镔领衔。在我的记忆中,这家预计创刊就印50万册的选刊,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出版,其领军人物顾尔镔因发表了一篇《也谈突破》的小文章,而成为受到中央批评的人物,所以创办刊物之事,也就无暇顾及,无形中流产了。面对21家文学期刊的协议,《小说月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协调与各原创文学期刊的关系。

在鼓浪屿会议上,与会者发表了些什么样的意见,不得而知。到年底11月召开的文艺创作会议上,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讲话历数一年来文艺界出现的问题时说,从《“歌德”与“缺德”》到鼓浪屿会议,是少数同志思想混乱、对中央关于文艺的一些根本性意见置若罔闻的两个例子。可以肯定地说,有人发言走了火。

温小钰:“我们还是肯定得太少”

中篇小说评奖一事决定后,《文艺报》编辑部拟从全国各省市邀请十几位编辑家、评论家、高校教师来京担任初选工作,为评委会正式投票决定做初步的准备。内蒙古大学中文系的温小钰也在被邀之列。她既是高校教文学的老师,又是作家和评论家,这几年在创作上颇有成绩。她在收到邀请之后,给我写来一封信。信里不光是谈这件事,还谈了她对文学现状的看法。

锡诚同志:

今天系里告诉我,《文艺报》举办中篇小说读书会,同意我去

参加。(因为我下学期有课,要缺一个来月课,因此他们慎重研究,并特殊优待了。)并说已经给你们回电报了。

这样,我将在2月10号左右进京赴会。

这次参加读书会的人不知有多少,另外,阅读中篇的范围有多广?时间紧,要搞出像样的评论也不容易,我在去之前需要做什么准备,望来信示知一二。

《土壤》^①在我们这里反响比较强烈,读者面也很广泛,因为我遇见的许多人,包括教师、编辑、学生、业余作者、农牧场干部、邮电局职员等等,都说读了这个作品,他们也都表示还比较喜欢。我们有的老师读了两遍三遍。当然,一些夸奖的话因为都是当我面讲的,多半是支持、安慰和鼓励的意思,不是客观、认真的评价。我和浙成特别希望听听你的意见,浙成说,在北京时间匆忙,来不及同你就作品充分交谈,而我们又十分需要和首都评论界的专家们通气,尤其希望你肯花一点时间,对这个作品发表一点意见。前不久,长春电影制片厂总编室曾来信,意欲将此作品改编电影,征求我们同意。我们当然没有什么意见,请他们自行其是去,只不过我们自己怀疑,这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作品,即人物的内心活动、思念、议论较多,没有那么多情节,要改电影,他们大概还得增加不少“动作”吧。

锡诚同志,很久不见面了,我觉得有许多想法需要同你交谈。首先一个看法是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当前中国的文艺创作,特别短篇小说创作的质量,是走在世界较前列的,无论内容的充实、深刻或写作手法的熟练、准确以及情绪的感染力,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我曾读过两篇去年美国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的获奖作品,说实话,与我们1978、1979年的得奖作品,特别是1980年来引人注目的一些作品相比,我们肯定超过他们。只说美国文学,斯坦贝克和海明威的一些短篇,也无法与我们今日的

① 中篇小说《土壤》,汪浙成、温小钰著,原载《收获》1980年第6期。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二等奖。

某些短篇匹敌,我觉得我们还是肯定得太少,也推荐得太少了。中篇成绩不如短篇,但也很兴旺,高潮也在崛起。作为一个评论工作者,我感到高兴、兴奋、自豪,但作为一个创作者,又感到巨大的压力。中短篇范围内的竞赛、竞争日甚一日地激烈,看得出,就是像茹志鹃这样已形成稳定风格的老作家也在不断探索新的题材与主题、新的手法与技巧,更不用说如小老虎般的后进中、青年作家了。

要说的话很多,来不及写,见了面再讲吧。

我忙,学期要结束,学生要考试,要辅导,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问昌仪好,她身体好吗?又在为什么苦战着吧。在呼和有什么要办的事吗?来信!浙成问你好。

祝

一切好!

小 钰

(1981年)1月8日

记得温小钰来过我的家里,她与文学所的吕薇芬和我的妻子马昌仪都是朋友,那天是由吕薇芬陪着来的。在我的记忆中,实际上她并没有能来参加信中说的第一次中篇小说读书会。是什么原因,我已经记不得了。也许是因为被推荐的作品名单中,有她和汪浙成的《土壤》?读着温小钰的这封书信,她那智慧的形象又闪动在我的眼前。那几年我们交往的情形也再次浮上了我的脑海。哪想到,帕金森病过早地夺走了这个很有才华的女作家的生命,太可惜了!



温小钰(左)与马昌仪

邀黄秋耘开专栏

《文艺报》从月刊改为半月刊,自然而然就增加了刊物的时效性和言论性。为把刊物办出特色,我们想了许多办法。我们想找几个能够胜任的专栏作家在刊物上开设专栏,每期一篇,或提出问题,或发表议论,既讲敏锐,又求深度。我做过一段新闻工作,世界上知名的报纸,没有不设专栏作家的。但专栏是一个以发表言论为宗旨的栏目,其作者,必须是我们对其写作能力与思想倾向知根知底的,否则,要么是思想倾向和文章路子与我们编辑部不对路,要么是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旦上了道,就可能出现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这样的专栏作家实在难找。我们商量过几个对象,但都难以下决心。身在广州的黄秋耘是一位既有水平而又与《文艺报》路数一致的人选,很合乎我们的口味。

前几年,我到广州组稿,去过他在梅花村13号的家里,一是去看望他,二是去组稿。“文革”前,他在《文艺报》工作多年,“文革”后回到广东,现在出版局当顾问,他实际上成了我们《文艺报》的同志出差广州的联络点。去年11月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二次学术会议在昆明召开,我们又在会上相遇,除了会上的活动外,还一起参加了《云南日报》邀集的小型座谈,我们两人的发言也都在该报发表了。他的文章题为《漫谈探索与创新》,发表于12月18日;我的题为《从思想到艺术的突破》,发表于12月4日。会间,我曾向他约稿,也曾商请他在《文艺报》开设专栏,探他口气,会后,也曾为此事给他写过信。今年年初,收到了他的回信。

锡诚同志:

惠函诵悉。日前从昆明寄上《往事与抒情》一稿,率尔操觚,不甚理想,如蒙采用,务希认真审阅,大力斧正为盼!

您建议我为《文艺报》写专栏文章,考虑再三,恐怕不能胜任。不过,今后我在写回忆录《风雨年华》之余,一定要多写一些

文艺随笔、杂文之类,投寄给《文艺报》,聊供补白之用。如不合用,就请退还给我,不必客气。您想到什么好题目,亦希随时示知,只要力所能及,一定效劳。

《风雨年华》拟化整为零,先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片段,但只限于写建国以前的事。第一季度可能先发表三四篇,大都是与文艺无关的。尚盼多提意见。

曾彦修同志年前来穗,拟创办一个专门发表思想性、政论性杂文的《生活》半月刊,嘱我代他组稿。我看,在目前的情况下,此举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尊见如何?尚希有以教我。

昆明会议的部分讲稿,已在1980年12月18日《云南日报》见报,您看到吗?

匆匆此复。并祝

安好!

永旺、阎纲、泰昌均此

秋 耘

(1981年)1月9日

设想是一回事,实际操作又是一回事。专栏是言论性的。在我们这样的舆论控制比较严格的体制下,80年代初,要想办成一个基本上尊重作者写作意愿而较少干涉的专栏,是很难实现的。这个专栏的设想最终也没有实现。前次去梅花村拜访他时,他就告诉我,他打算写一部回忆录《风雨年华》,但只写到新中国成立前。现在他是广东省出版局顾问,谁都知道,顾问不过是一个闲差、一种安排,没有实事可顾可问,写作才是他的主业。这部回忆录于1988年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给我寄来的文章《往事与抒情》,是我们的约稿,一篇散文写作的经验谈,发表在《文艺报》1981年第3期的“我与散文”栏目中。

姚芳藻约我为《中国百科年鉴》撰稿

在昆明开会时,我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年鉴编辑部的负责人姚芳藻相识了。姚芳藻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知名的女记者,先后担任过《大公报》和《文汇报》的记者,1956年因报道《文汇报》发动的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与丈夫梅朵一起被卷入钟惦棐的“向党进攻”的“电影的锣鼓”一案中。能认识这位仰慕已久的名记者,我很高兴。无论年龄还是经历,我在她面前都是一个小弟弟。她说他们正在为编1981年的《中国百科年鉴》组稿,要冯牧为他们写一篇1980年文学发展的专文,但冯牧没有时间写,现在约我执笔撰写,稿成后与冯牧共同署名。我答应了她的约稿。冯牧委托我执笔的事,此前也有过一次,是为日中友好人士编辑出版的《使者》杂志写的一篇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文章。从昆明回京后,她又给我写来一信,告诉我长篇、中篇各写多少字数,这是年鉴的规矩。我很快写出了《与人民同呼吸》等短文,寄给了她。她收到我的信后,致信于我,说稿件收到了。她的来信说:

锡诚同志:

稿件收到,谢谢你的大力支持!拜读了,我觉得很好,对我们很合适,现在要看领导的意见了。我估计领导不会有很多意见的,比去年质量有很大提高。

这两篇字数也十分合乎要求,长篇小说是否动笔了?只要500字就可以了。上封信里我已告诉了为什么要求短些。

谢谢你对我很大的帮忙。在昆明,你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希望今年再相见!

敬礼!

芳 藻

(1981年)1月11日

《中国百科年鉴》(1981年卷),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精装,16开,是一本权威性的年度百科。我的小文章就登在这一卷上。这是我与她的头一次交往。后来我们还有过好几次来往。记得《文艺报》主办的“1977~1980年中篇小说评奖”结束要举行发奖大会时,她又找到我,要我写文章,并向她提供获奖名单。

我是1957年反右结束后才从学校到文艺单位来的,因此对于姚芳藻,我没有更深的了解。我始终纳闷的是,“文革”后,她为什么没有回到《文汇报》而到了大百科去主持编辑工作。近几年读到她写的一些《文汇报回忆录》和《柯灵传》等,才对她多了一份了解。她的丈夫梅朵我倒是有接触。因为“文革”后他仍然搞电影评论,常来北京,来我们编辑部,或出席我们编辑部召开的会议,常给我们写文章。他与唐达成、文椿都很熟,所以我们也常见面和交谈,有时就在我们简陋的办公室里一起吃中饭。1月24日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在京成立,钟惦棐被推为会长,梅朵和程季华、罗艺军被推为副会长,会后,他还到我们编辑部来过。他在《文艺报》1981年第4期(2月22日出版)上发表的《希望——漫话1980年的电影》一文,大概就是这次来京时写的。他对1980年的电影的评价是很耐人寻味的,不妨在这里记下一笔:“如果简单地说,1980年的水平比1979年降低了,可是1980年拍出了像《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法庭内外》等一些好影片。它们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在艺术和思想的成就上,显然比起1979年的好影片有较大的突破与进步。如果简单地说,1980年是在1979年的基础上前进了,则显然是不合乎事实的,因为1979年的电影还没有出现一种令人忧虑、不安的倾向,并没有像1980年这样拍出了相当数量脱离现实生活、假大虚空、情趣低级的影片。其中有的影片的情况特别严重,它们即使是在30年代和40年代,也会为我们的进步电影工作者所反对。”真是一针见血,文如其人。

喜读张弦《未亡人》

在上海参加创作会议时,张弦给我看过一篇题为《未亡人》的短

篇小说的手稿,让我提意见,说是应《文汇月刊》(该刊由梅朵主持)之约而写的。看过后,我颇为赞赏。后来,他又告诉我,编辑部提出了一些意见,要他修改。1月中旬,我接到他1月12日发自南京的信,说是小说已在《文汇月刊》1981年第1期上发表了。来信如下:

锡诚兄:

顷接来信及照片,谢谢!你离宁时因郑秉谦他们来了,未能去送你,真抱歉!后来我还是去了桂林一趟,见到李中岳同志,他说你去了昆明,你这次外差可真够辛苦的了。

谢谢你的关心,在《文艺报》发了我的消息和照片。南开大学的老师是通过我单位一同事处拿去了我的自传,文稿我未见,只听说写成了。我建议他们先送你看看。如可用,当然好。要你多费心了。

《钟山》我这里还有,千万不必再寄还了。那个中篇,作为当时生活的反映,今天似还有认识价值。但在读者中的反应并不强烈。不知其他同志看后有何意见。

你在上海看过的那篇《未亡人》,修改以后,《文汇月刊》以为有进步,已在元月号上发表。尚未出版。待我收到后当奉寄一册请予指教。

此间已开始传达中央最近的文件和有关报告。文艺界议论不少。今年创作方面怕多少又要受点影响了吧!中国的事,实在也太难办。

暇时盼常来信。即祝

冬安!

张 弦

(1981年)元月十二日

张弦是个不事张扬的人。他勤于思考也善于思考,作品数量虽不多,但每篇作品都有出人意料的新意。他复出后的作品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也引起了相当激烈的争论。我们在《文艺报》上发表过

一篇小文章并配照片,对他作了介绍。^①在此前后,由《人民文学》主持的全国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上,围绕着《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发生了很大的分歧,肯定这篇小说的有冰心、王蒙、冯牧、袁鹰。冯牧说,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虽然写了男主人公摸存妮的乳房这个细节,格调不高,但从整体看是个优秀的短篇。否定这篇小说的有魏巍、草明、唐弢。草明认为小说写了人的生理本能,唐弢说写的是兽性。最后,这篇小说还是入选了,但名次排得相当靠后。



张 弦

信中所说的在《钟山》上发表的,是他早年写的一个中篇《苦恼的青春》。我从他那里拿走路上读的,答应还他的。

《文汇报》发表的《未亡人》,也像《挣不断的红丝线》一样,给我的心灵以猛烈的冲击,未亡人周良蕙在丈夫、市委副书记死后12年仍然不能有爱情、只能守寡,在精神上所遭受的折磨和摧残,正是当时中国社会上任何一个年轻的未亡人的命运的写照。于是,我很快便写了一篇《读张弦的〈未亡人〉》小文章,感喟道:“一个寡居了12年而年仅43岁的市委副书记的未亡人,一个虔诚的爱情的追求者,一个刚刚开始意识到人性的尊严的稚子,同一个比她只年轻五岁的普通邮递员之间发生的爱情,却遭到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指责和诽谤,无形的压力像达摩克利斯的剑悬在她的头上。”^②也许我对张弦的小

^① 见《文艺报》1981年第2期。同期发表的,还有茹志鹃和陆文夫的近况报道。

^② 《读张弦的〈未亡人〉》,见《文艺报》1981年第5期;后收入拙著《作家的爱与知》,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说有所偏爱吧,三年后,1984年的夏天,谢永旺主持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时,组织一批评论家在西山住了一个月,分头写作《当代作家论》一书,我应约写了一篇全面论述张弦小说的论文《张弦论》。^①张弦逝世后,他的第二任夫人、电影导演秦志钰女士在张弦生前好友、散文家、原《十月》杂志的老编辑张守仁的帮助下,为他编辑出版一部一卷本的《张弦小说选》,张守仁给我来电话,说要把我的这篇文章作为附录收在书中,征求版权意见,并说“选来选去,你这篇文章是写张弦的文章中最好的一篇”。文集出版后,秦志钰导演到我家里来给我送书,向我叙说张弦的人品、创作和他们的爱情。我见书思人,收在文集中的拙作,也算我和张弦多年神交的一个纪念吧。

散文家岑桑

岑桑是岭南散文家,出版过散文集《廿世纪的野蛮人》、《巨人和狼》、《幽灵在徘徊》、《当你还是一朵花》等。他写过各种题材的散文,但在我的印象中,倒是他写的杂文和随笔更有特点。粉碎“四人帮”之后,他担任了广东人民出版社分工主管文艺图书的副总编辑。我几次到广州去拜访当地文艺界人士,也曾去大沙头广东人民出版社,从而与他相识。后来文艺编辑室从人民出版社分出来,成立花城出版社,他成为花城出版社的负责人,至于是社长还是总编,我就不清楚了。

我们编辑部几位同事组织选编的《当代女作家作品选》第1、2卷,就交给他们出版。选集出版后,署名丁玲等著,压根儿没有署我们的名字,变成他们广东人民出版社自己编选的选集了。且不说这部选集的策划的创意,“五四”到30年代出版过类似的女作家的选本,新中国成立30年来却没有出版过一本女作家的选集,我们提出的这个选题,自然是带有开创性的,出版社此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

^① 《张弦论》,收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编:《当代作家论》(第1卷),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